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

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魯賓斯坦著

時代出版社

魯賓斯坦著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

由戰爭轉向和平時期

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曹汀 梁達

葆煦 郝立

等譯校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Н. Рубинштейн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годы перехода от войны к миру
(1921 — 1922)

Перевод Цао Тин и др.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

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25開345千字

著者：魯賓斯坦

譯者：曹汀等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裝訂者：源豐裝訂所

3,001—9,020冊

1950年10月北京初版

定價22,400元

1954年1月第二次印刷

目次

前言	一
序	五
第一章 一九二一年初蘇俄的國際地位及英蘇貿易協定	一一
第二章 一九二一年上半年蘇俄與德法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相互關係	四五
第三章 蘇俄與近東及中東各國	六六
第四章 蘇維埃外交政策中的遠東問題	九三
第五章 蘇維埃政府對伏爾加河流域大飢饉所進行的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	一〇八

第六章	對蘇俄外交壓迫的加強及新的武裝干涉計劃·····	一四七
第七章	一九二一年末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反蘇國際干涉計劃的破產·····	一八〇
第八章	加那會議及蘇俄之被邀參加熱那亞會議·····	二一五
第九章	以熱那亞會議召開爲中心的外交鬥爭·····	二四八
第十章	熱那亞會議前的蘇俄外交政策及外交·····	二九六
第十一章	熱那亞會議工作之開始和蘇德拉巴羅條約·····	三二九
第十二章	拉巴羅條約簽訂後熱那亞會議上的外交鬥爭·····	三七三
第十三章	熱那亞會議的結束階段及其總結·····	四一七
第十四章	蘇俄在海牙會議上·····	四五七
結束語·····		五〇四

附 錄

一 熱那亞會議

一、熱那亞會議召開前的外交鬥爭

英國政策新的轉變·····	五二一
德國外交手法·····	五二二
加那會議·····	五二五
法國的花樣·····	五三〇
波蘭及波羅的海各國聯盟·····	五三五
美國和熱那亞會議·····	五三七
蘇維埃共和國和熱那亞會議·····	五三九
波羅的海會議·····	五四五
蘇維埃代表團在柏林·····	五四七

二、熱那亞會議

會議在熱那亞開幕·····	五四九
帝國主義者的要求·····	五五六
阿爾別爾其斯別墅的會議·····	五五八
拉巴羅條約·····	五六五
協約國和德國·····	五七〇

蘇維埃代表團的新建議·····	五七一
協約國的備忘錄·····	五七六
熱那亞會議的結束會議·····	五七九

二 海牙會議

會議前夕·····	五八二
蘇維埃國家的和平步驟·····	五八六
海牙會議·····	五八六
海牙會議的破裂·····	五九四

前言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蘇俄和帝國主義間外交的鬥爭是蘇維埃外交的初試鋒芒，是堅持蘇維埃和平政策的原則性和利用帝國主義間矛盾的靈活的策略性運用的範例。當時年輕的蘇維埃政權雖已基本上打垮了帝國主義聯合的武裝干涉，但敵人尚未被全部趕出國境，日本帝國主義還蟠據着遠東共和國的一部領土。烽火方息，但天災却接踵而來，伏爾加河流域大飢饉嚴重地威脅着蘇維埃國家。因此，年輕的蘇維埃面對着嚴重的經濟窮困。這時正是處於列寧所說的『第四個階段。協約國被迫停止了（能夠長久嗎？）武裝干涉和封鎖。遭受空前經濟破壞的國家剛剛開始恢復元氣，祇是現在才看出經濟破壞的全部深度，經受着最艱巨的苦難：工業停

頓、歉收、飢荒、流行病等等」●。

當時國際形勢，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存在着『某種均勢』；特點就是：『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充滿了對蘇俄的瘋狂仇恨與敵視態度，決心隨時侵犯，以便一舉而塞死俄羅斯。另一方面，雖然以前蘇維埃政權比現時要弱，而那時在蘇俄境內又有俄國地主與資本家的戰鬥部隊，但國際資產階級耗費了幾萬萬佛郎進行武裝干涉，其全部企圖終歸完全失敗了。……由於這一切條件的結果，縱然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蘇俄要強得多，但國際帝國主義非獨無力來塞死它，反而不得不暫時地承認它，或只承認它一半，而與之訂立通商條約』●。

這樣，正如本書所詳細闡述的，帝國主義在武裝干涉失敗之後，企圖採取一種新的計劃，即用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輔之以兵力的方法來消滅蘇維埃制度。這一計劃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打算建立一個反蘇的統一陣綫，乘蘇俄戰後經濟崩潰和飢饉以達到推翻或壓服蘇維埃政府的目的。因此，以一切力量擊破帝國主義的反蘇統一陣綫，遂成為蘇維埃外交中心的任務。

● 列寧文選第六冊，解放社版第一二四頁。

● 列寧文選第六冊，解放社版第一〇四—一〇五頁。

蘇維埃代表團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會議和海牙會議上和帝國主義成功的鬥爭就是完成這一任務的輝煌的範例。『熱那亞和海牙會議肯定地告訴我們，列寧、斯大林所領導的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外交，由於它的原則性、由於它在極複雜的環境中善於掌握方向、由於它長於把一貫性和原則性與靈活的策略配合起來，所以與資產階級的外交截然不同，而在外交藝術方面大大地超過了後者。……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蘇維埃外交政策的勝利乃是一貫不移地推行布爾什維克黨路線的結果，乃是基於通曉社會發展規律的列寧、斯大林戰略策略的結果』。（見本書結束語）。

因此，研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蘇俄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史，特別是熱那亞和海牙會議，對於我們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是有着頭等的意義。本書對於熱那亞會議召開前、召開中以及召開後（海牙會議）的各種外交鬥爭敘述得非常詳細而且深刻，但是爲了使讀者對於熱那亞和海牙會議能有更深刻的印象，又從蘇聯教授波瓊金所著的外交史第三冊中擇譯其六七兩章，附錄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本書由石橋、劉錚、郝立、梁達、葆煦、吳祖烈、孫偉、段繼棠、吳保泰等同志繙譯。梁達、葆煦同志分別復校，再由本人末校而成。其間雖幾經校閱，但由於譯校者各方面修養不

夠，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尙望讀者指正。

曹汀

一九四九，十二，九，於北京

序

在結束內戰和擊潰武裝干涉之後，過渡到和平的年代在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上，是最關緊要的階段之一。

這個時期正是歷史上主要的問題——建立在最進步的社會關係的社會主義制度上的國家存在與否的問題——剛剛爲紅軍在前綫的勝利所解答了的時候。

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各國並存——來臨了。

蘇俄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的外交史是非常豐富的，它充滿了許多大事件。只要提到以下的事實就足以說明了，就是正在這一時期，蘇維埃政府和波蘭締結了和約；和英、德、意及

其他歐洲各國簽訂了協定；和波斯、土耳其、阿富汗、蒙古等國簽訂了條約；順利地抵抗了由於伏爾加流域大飢饉而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的壓迫；而且參加了熱那亞、海牙、洛桑會議和莫斯科軍縮會議。

但是並非事件的琳瑯滿目本身足以引起研究者對於我們所檢討的這個時期的注意。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是蘇維埃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相互關係中建立新時代的年代；是由戰爭、封鎖過渡到和平關係、通商關係和正常的外交關係的年代；是蘇俄在國際地位上根本轉變的年代。這種關係的新的形式不是在擊潰干涉者及白匪之後突然產生的。

首先，各資本主義列強曾企圖用外交的方法和經濟的壓迫來『重行檢討』蘇維埃人民勝利的成果，並再事審查兩種社會制度並存的事實本身。

其次，當這個企圖失敗了的時候，就在緊張的鬥爭中——已經不是用軍事的方式——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將在怎樣的條件下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存在——在平等的還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

列寧和斯大林曾把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起初時期的關係形容爲『不穩定的平衡』，把這種『不穩定的平衡』代之以穩定的平衡，所需要的時間不僅是累月而且是經年的。

在戰後最初的幾年，蘇維埃和平時期的外交政策已經奠定了基礎，而這種政策的許多路線已經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期間被確定了。

研究的主題本身——其中心即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係問題——要求我們對它必須採取有別於研究資本主義國家間之關係的特別的研究方法。

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天起，對蘇關係的問題，毫無例外的成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經常的和尖銳的鬥爭的對象。這個問題遠遠地超出了內閣會議和外交談判的範圍。無論是在文獻中和刊物上、在國會及國聯裏、在各政黨的大小會議上、在各種集會中、在羣衆運動中——圍繞着『俄羅斯問題』，到處都有各種不同階級及社會集團的態度、意見及政綱在衝突着。

列寧寫道：『……在各國間所發生的爭論，事實上是一個擁護或者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問題』。●

資產階級國家的『俄羅斯政策』的本身就體驗到了黨派間這一鬥爭的強大的壓力。

把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的這個概念應用於蘇俄，就充滿了新的、更其廣泛和深刻的內容。因此一個研究者除了直接地研究外交史之外，更重要的是看清資本主義國家各階級及各政黨對於蘇俄問題的態度。

資產階級在編纂歷史時，照例總是曲解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時期中的蘇維埃外交政策的真實的動機與目的，抹殺和壓低蘇俄在國際關係上的地位。

應當向大多數外國歷史學家們提出這一控訴，但是要把那些臭名遠揚的毀謗者們撇開，因為他們的著作根本不能列入歷史文獻。

這不是什麼個別的錯誤或者關於某一問題的不正確的解說，而是他們對於整個問題去加以不真實的、根本罪惡的論述。這一罪惡是在於他們的虛偽的方法論上，在於他們藐視社會發展規律而分析『俄羅斯問題』的企圖上。

由於否認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規律性，由於否認蘇維埃國家的進步特徵，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甚至是最善良的，也不能了解蘇維埃外交政策的內容、目的和方法。他們不能正確地決定蘇維埃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在某一時期對世界政治的影響。

由此就力謀混淆蘇維埃國家的外交政策和沙皇時代的外交政策。由此就企圖降低作為世界

政治因素的蘇維埃國家的重要性。

無庸置疑，西歐及美國歷史編纂者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態度大部爲其階級的及政治的動機所決定。

擊潰了反蘇的武裝干涉，才迫使資本主義列強同最初在事實上承認，然後才在法律上承認的蘇俄建立通商和外交關係。力謀消滅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期間對蘇政策的破產的事實，資產階級的政客們作出蘇俄向西歐及美國資本主義低頭的詭辯。

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們，如像斐薛、卜斯、蘇阿爾特、波蒙之流，直到今天還在重複着那種完全虛偽的武斷，或者像約但和伏爾費斯一樣，企圖掩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期間蘇維埃外交政策歷史上勝利的事實，他們顯然是忘記了：『作爲特別藐視辦法的隱瞞手段，也是一種批評形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畢竟是一種批評形式』^①。

研究這一時期蘇維埃國家的外交政策，對蘇維埃史學家有更重要的意義，他們有責任從根本上用列寧斯大林的指示，以恢復歷史事件的客觀真象，給予真實可靠的評價，並揭穿資產階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莫斯科一九四八年版）六八四頁。